本版编辑：张丹丹 版式设计：李 婧 | E-mail:f6@studytimes.cn Tel:010-68929610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定义好老师

□ 夏立新

纵观人类文明史，每一次技术范式的跃迁，都会引发教育逻辑的深刻变革。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教育生态，深刻改变了知识的获取方式，改变了课堂的交互形态，也改变了人才的培养标准。技术越是无孔不入，教师的作用越不可替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教师做的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人工智能时代，无论智能算法如何精进，教师铸魂育人的神圣使命永远不会变，好老师永远是时代的需求。

理想信念坚定的“人师”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可以精准推送知识，却无法指引人生航向；人工智能可以模拟逻辑判断，却无法传递理想信念。在信息爆炸、价值观念多元激荡的今天，“人师”的意义更显珍贵。好老师要以坚定的教育信仰、高尚的教育品格和赤诚的教育温度，成为学生在数字浪潮中不偏航、不迷路的精神灯塔。

坚持传道者先明道。在人工智能深刻改变认知方式的当下，好老师更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先明大义，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好老师应凭借深厚的理论素养看清数字背后的真实逻辑，以信仰凝聚共识，以思想启迪智慧，避免教育沦为信息的堆砌与盲目的跟风。尤为重要的是还要在价值多元中站稳政治立场，在技术迭代中保持战略定力，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引领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家国品格，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坚持以德立身施教。人工智能可以模拟话语，却无法模拟人格。智能技术越是深刻改变知识生产和学习方式，越需要大力践行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的内涵包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教育家精神应该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好教师的精神内核，是抵御技术功利化、教育工具化倾向的重要精神支撑。好老师要把教育家精神贯穿课堂教学、实践指导、学术训练与师生交往的全过程，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勇担责任，以高尚师德、深厚情怀和人格力量影响学生、感染学生、成就学生。

坚持传递教育温度。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人工智能可以进行知识推送、作业批改、学习诊断和路径推荐，却难以真正理解学生的情绪波动、成长困惑和生命体验。教师的不可替代性，正在于能够看见具体的人、理解真实的成长、回应复杂的处境。好老师要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关注学生发展可能，在学生迷茫时给予方向，在学生受挫时给予支持，在学生成长关键处给予点拨。教育越智能，越需要教师守护人的主体性和完整性，使教育不被简化为数据计算和效率竞争，而始终成为温暖人、唤醒人、成全人的事业。

专业底蕴深厚的“经师”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得知识获取的门槛被显著降低，在“知识触手可及”的时代，好老师要成为知识的深度加工者和学生能力的高阶开发者，以扎实的学问修为赢得学生的尊重与信赖。

激发好奇心，拓展知识边界。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人工智能可以在数秒内生成知识解释、教学资源和学习反馈，但无法替代教师对学科本质、学生认知状态和教育情境的专业判断。知识可以被算法推送，好奇心的培养却需要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联结与思维碰撞。好老师要尊重和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善于捕捉学生眼中的探求欲，鼓励学生不断提问和追问，带领学生走向开放性问题和尚未被定义的知识领域，培育学生持续学习的内在动机。

构建新范式，重塑专业角色。人工智能时代的“经师”，不再是技术的被动使用者，而是智能教育的主动设计者，其角色重心正在从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架构师，成为持续更新专业理解、重构教学内容、引领学生深度学习的发展型教师。课堂教学是教师工作的主阵地，也是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的核心场景，好老师应聚焦学习任务设计、思维引导与情感激励等个性化工作，形成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技术应用观。

甘坐冷板凳，坚守治学品格。在算法追求流量与速度的当下，知识生产方式与传播格局正在深刻重构。热点更迭频繁，信息碎片化，显绩更受追捧。然而，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科学研究，都不是速成的“快消品”。好老师应当以身作则，践行“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在求快的技术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学术定力，不盲从算法的推荐逻辑，不追逐表面的学术热闹，把学问做扎实、做精深，用深厚的学术积累滋养教学、启迪学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悟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

善用智能技术的“能师”

真正的智能教育，不是让教师让位于技术，而是让技术服务于人的成长。人工智能变革了教学工具，也对教师能力体系的重构提出了要求。

强化数字教育意识，增强引领教育变革的主动性。数字教育意识的提升，本质上是教师认知方式与智能技术协同演进的过程，体现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时代跃迁。好老师应深刻理解人工智能对教育理念、教学方式、学习形态和评价机制带来的系统性影响，既看到其推动教育创新的潜力，也警惕其可能引发的安全与伦理风险。既不盲目崇拜技术，也不消极排斥技术，在教育规律指导下审慎选择、合理应用、持续改进，确保技术应用始终不偏离育人方向。

夯实数字教育能力，系统提升教学创新的本领。好老师要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技术特性和适用条件，能够拥有敏锐的批判性思维，对生成结果进行精准的鉴伪与综合处理，并指导学生科学合理规范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智能技术无缝融入日常教学，根据教学目标选择恰当的智能资源和应用工具，设计出兼具前沿创意和具体实效的优质课程内容。灵活运用智能技术的数据处理能力精准掌握学情，运用人工智能采集多模态过程性数据，结合可视化分析开展科学客观的学业评价，针对学习差异及时进行个性化指导，推动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有机结合。

坚守数字教育伦理，构筑数字教育的安全防线。在技术高度介入教育领域的时代，好老师必须主动学习数字教育伦理规范，坚持以育人需求为核心合理使用技术，确保数据采集仅限于教育教学，严密守护学生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全面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防范技术作弊、数据投毒，维护健康的应用环境。面对复杂的信息场域，教师还需提高对误导性、偏见性内容的辨别与处置能力，抵制和纠正算法推荐带来的价值偏差与不良引导，构筑牢固的数据安全防线，确保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安全应用。

把“人师”做好，把“经师”做精，把“能师”做成，让技术有尺度，让教育有温度，在人机协同中更好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赋能每一位学生的全面成长，这正是人工智能时代好老师的核心要义。师范院校是教师教育的主阵地，是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变革的关键力量，必须在培养目标上再聚焦、在培养模式上再优化，主动对接人工智能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新要求，把“人师”“经师”“能师”三维素养要求贯穿教师培养全过程，形成课程、实践、发展、评价协同推进的培养体系，源源不断培养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胜任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使命的好老师。这是师范院校的时代责任，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础工程。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大学书记校长论坛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正确政绩观

□ 廖冲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积淀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与为政道德规范，从“民为邦本”的治理理念到“清慎勤勉”的官德修养，从“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到“功在长远”的担当意识，无不蕴含着滋养正确政绩观的深厚养分。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挖掘这份宝贵遗产，推动其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涵养政绩担当、提升治理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为邦本，政绩当以百姓心为心。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智慧将民心向背视为政权根基。《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先贤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洞察。苏轼在地方为官数十载，秉持民者天下之本的理念，认为统治者可以亲近而不可疏远民众，若自命不凡而蔑视百姓，政权便危在旦夕。在杭州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在徐州率众抗洪、保全城池，在惠州引水便民、推广秧马，桩桩件件都是从百姓实际需求出发的务实之举。苏轼坚持“民可近，不可下”，强调为政者须以谦卑之心贴近民众，这正是其政绩能够跨越千年被传颂的根本原因。

中华大地上处处都有闪耀着民本思想光辉的古代工程。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历经两千余载风雨依然守护着成都平原。蜀郡守李冰并未墨守成规筑高堤、修大坝，而是深入岷江沿岸细致考察水势特性与河道地形，因势利导造就千年民生工程。《史记》记载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这份沉甸甸的政绩，源于李冰对百姓疾苦的深切体察，源于他治水必躬亲的务实精神，更源于他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贯穿治水实践始终。

为民造福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古人云：“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这种将百姓利益置于至高位置的执政理念，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要回答政绩为谁而树这一根本问题。凡是造福百姓的事，再小也要用心去做；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事，再小也不能肆意为之。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最高标准，才能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实干为要，政绩当以落地见效为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靠的是脚踏实地的耕耘。先贤将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三不朽”，其中立功便强调须以躬身践行达成济世之效。历代官箴常以勤勉为首，勤政实干是为官本分。回望历史，但凡卓有建树的时期，无不与务实作风紧密相连。正是这种实干精神，支撑起文明赓续的实践根基。

实干如同耕耘，春不种则秋无收，容不得半点虚浮。真正造福于民的举措，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有些事业看似平凡，起初不过是一砖一瓦的堆砌、一锹一镐的开凿，但积年累月坚持不懈，终成不朽之功。治水如此，垦荒如此，兴教如此，万事皆如此。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政绩从来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而是干出来的实绩。

实干最忌急功近利。为政者当遵循规律办事，切不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历史上有些时期政令频出、工程不断，看似热火朝天，实则民不堪命，这样的教训值得深思。真正的实干，是尊重规律、顺应自然，实实在在为群众谋利。就像种树，不能揠苗助长，而要耐心培土浇水，静待其自然生长。治理之道亦是如此，循理而动，循序渐进，方能行稳致远。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实干苦干巧干，方能成就实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造声势、搞盆景的虚功。群众看政绩，不看口号看实效，不看展板看变化。只有沉下心来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才能把蓝图变为现实，把承诺变为成果。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实干兴邦这一条永远不会过时。

清廉为本，政绩当以操守自律为基。为政者的立身之本，首在官德。先贤论及官德，常以“清慎勤”三字概括之。清者廉洁自守，慎者谨言慎行，勤者夙夜在公，三者相辅相成。而清又居首位，是其他两者的根基。唯有自身清白，方能秉公办事、取信于民；唯有内心干净，方能放开手脚、无惧无畏。

清廉与政绩的关系，在史册中清晰可见。真正造福一方的官员，无一不是廉洁自律的表率。他们能够为百姓撑起一片天，正在于自身正直、无所顾忌。反观贪墨之辈，纵然一时得势，终究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一正一反，发人深省。史笔如铁，从来只敬畏那些干干净净的人。

清廉不仅是底线，更是境界。权力在手，面对的诱惑形形色色。能够守住清白，需要内心的定力，需要明辨义利的智慧。孔子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份淡泊与通透，正是清廉境界的写照。当一个人把名利看淡，把职责看重，自然能够心无旁骛地为百姓做事、为国家创业。这样纯粹的心境，往往能成就真正值得称道的政绩。

清正廉洁是政绩观的底线所在。一个干部能力再强，在廉洁上出了问题，不仅个人身败名裂，更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守住政治关、权力关、交往关、生活关、亲情关，正心明道、怀德自重，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唯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所创造的政绩才能让人服气，才能经得起群众监督和时代检验。

功成不必在我，政绩当以长远发展为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历史耐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老话道出了长远眼光的重要。真正利在千秋的事业，往往需要几代人接续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懂得这个道理，为政者才能沉下心来做事。

实践中，有些工作可能很长时间都看不到明显成效，甚至在自己任内都难以完成。但如果这件事确实利国利民，就该毫不犹豫地去做。为政者当有这样的格局：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把个人进退荣辱和名利置之度外，一心只做利国利民的长远之事。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要干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追求立竿见影的显绩，也要甘于做一时难以见效的潜绩。不急功近利，不贪一时之功，以滴水穿石的韧劲把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唯有如此，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跑中跑好属于自己的一棒。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文化视点

君子“与人为善”

□ 马爱菊

“与人为善”一词，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时至今日，人们仍常使用该词，然而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善待他人的处世智慧，比如懂得换位思考、善于理解他人或是乐于帮助他人。结合传统解释，“与人为善”实际上大致包含着君子好善、君子助善以及天下共善三层含义，与今人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距。厘清“与人为善”的含义，总结其所蕴含的人文智慧，在当下不仅具备一定的正本清源学术价值，也有着较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君子“与人为善”的第一层含义是君子好善。孟子对“与人为善”的完整论述为：“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认为，君子乐于称道他人之善，并能取别人所长来成就自己之善，这就是“与人为善”。同时，“与人为善”也有通过学习、效仿他人之善来行善或者同别人一起行善的意思，这是君子之美德。然而什么是“善”？孟子的回答是“可欲之谓善”。朱熹对此解释道：“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凡值得人心向往的就叫作善，对于一个人来讲，其为人之风范如果是值得被向往的，那他就称得上是善人。

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主要就在于能够心怀善意，友善待人，一生好善、乐善。君子好善，源于善具有涵养自身的积极价值。君子在行善过程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见贤者就会自觉向他看齐，看见不贤之人或事则会自我反省有无类似问题，以他者为镜鉴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最终让一己之善转化为整个社会奋发向上、共趋至善的精神力量。

“与人为善”第二层含义是君子助善。朱熹认为“与人为善”中的“与”“犹许也，助也”，即赞许、帮助的意思。他把“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理解为“取彼之善而为之于我，则彼益劝于为善矣，是我助其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劝于为善，君子之善，孰大于此”。汲取他人之善并积极践行，那么对方就会受到鼓励，愈发积极行善，这其实是君子在帮助他人行善。若能做到使天下人都受到鼓励、乐于向善的话，那么，在君子诸多善举之中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的呢？

君子助善即帮助他人乃至天下人皆能趋善而行。在这个意义上，与人为善有成人之美的意思。《论语·颜渊》篇就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与人相处，一贯以善意待人、成全他人，所以乐于成就别人的好事与美德。善不仅是君子个人的道德追求，还是君子通过引领、激励的方式，使他人趋向人格完善。所以，君子助善的理想，就是以一人之善为起点扩展为天下人之同善，从而移风易俗、化成天下，使整个社会风气都积极向善。

如前所述，君子“与人为善”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推己及人、成就天下之共善。这也可以说就是北宋理学家程颢所言之“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也曾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言舜之所为，又有大于禹与子路者。‘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己未善，则无所系吝而舍以从人；人有善，则不待勉强而取之于己。此善与人同之目也。”大舜的伟大在于呈现出与天地万物同体痛痒的生命最高状态，其行善不仅是成己之善、成人之善，更是成就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的裁成辅相之大善。

君子做到“与人为善”，关键是有仁者情怀。真正的行善必须依循内心良知，当心中不再夹杂私念、不为名利所左右时，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便自然消融，人与万物之间的隔阂也随之瓦解。因此，君子充分涵养自身品德，着眼于大众共同的福祉，将个人道德实践融入对天下苍生的整体关怀之中，才可能真正触及“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与人为善”这一理念跨越两千余年，依然具有鲜活的现代价值。其现代价值体现在多重维度：在个人修养层面，“与人为善”的古义则提醒我们：善不是自己独有的，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共同成就的。能够欣赏他人的优点、承认他人的长处，本身就是君子人格的价值取向。在人际关系层面，“与人为善”意味着以善意对待他人、以宽容回应误解、以真诚化解隔阂。值得注意的是，“与人为善”并非无条件的妥协或退让，而是基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性态度，要求我们既要保持善良和宽容，也要坚持原则和底线。

我看君子文化